

论张宗泰的目录学思想

史丽君

(首都图书馆 历史文献中心 北京 100021)

[摘要]张宗泰著有《鲁岩所学集》《中州集略》等,于目录学多有阐发。考其著作,可见其论次目录体制、钩稽典籍舛误、探讨著述方法、推阐微旨得失的目录学思想。张宗泰的目录学研究,体现了清中后期私撰目录体制多样化、注重文献校勘等学术特点。

[关键词]张宗泰;目录学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0712(2017)02-0015-05

鲁山张宗泰(1776—1852),字鲁岩,号秋斋,先世居河南堰师,后因水患徙居鲁山而著籍,故自署“鲁山张宗泰”,历任怀庆府学教授、修武县儒学教谕、河南府学教授。近世学者对其著述多有征引及佳评。如陈垣《通鉴胡注表微》^[1]《广书林扬榷提纲》^[2]曾从张宗泰考辨中取材;郑振铎颇喜《鲁岩所学集》,称其“可随身携带”^[3];张舜徽称《鲁岩所学集》颇能“雠对文字之异同,勘比故实之舛误”“题识清代文集之作较多而较精”^[4];来新夏曾撰文称张宗泰为“乾嘉时一位隐而不彰的古典目录学家”^[5]。张宗泰一生于四部书目手披目览,听夕不厌,每读一书必钩稽其得失,校正其异同,字栉而句剔之,虽著作流传不多,但皆有可称道之处,本文不揣谫陋,略申其著述及目录学思想。

一、张宗泰的著述及其版本

(一)《鲁岩所学集》15卷附补遗,《鲁岩余事稿》2卷,《鲁岩交游记》1卷

此3种著作多合刊,故一并论述。《鲁岩所学集》(以下称《所学集》)15卷附补遗为张宗泰生前手定,此书以四库提要为宗旨,以书目题跋和分卷考辨的形式考证群籍,大略以卷1至卷6考辨史部典籍,卷7至卷10《阮亭亨瀛洲笔谈后》篇考辨子部典籍,卷10《跋唐阙史》篇起至卷11考辨《知不足斋丛书》收录诸书,卷12至卷13考辨历代别集,卷14至卷15内容考辨历代总集。卷后附补遗15篇。《鲁

岩余事稿》分上、下两卷,为张宗泰诗集。《鲁岩交游记》收文28篇,依人列目,记张氏历年交游。此书笔者经眼有3种版本:其一,清道光30年(1850年)初印本,卷前有《阮云台先生书》《所学集自序》、张宗泰嘉庆丁卯科乡试卷。其二,清光绪21年(1895年)重印本,未收乡试卷,但增清光绪丁酉(1897年)孙葆田后序、清光绪21年朱寿鏞跋两篇。另,此后印本《鲁岩交游记》为重刻,道光三十年本版式不一,但内容无损益。其三,民国二十年(1931年)模宪堂本,增民国十三年(1924年)张凤台后序。现通行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本,皆据民国二十年(1931年)模宪堂本影印。

(二)《中州集略》6卷

据王广庆《中州集略·序》载,《中州集略》为张宗泰遗著,其书成后久不流传。民国时期,张宗泰曾侄孙张钊搜集先祖手泽,于1928年在修武县检得此书抄本7册。抄本原不分卷,著录明以前中州各家别集,王广庆认为“阙明以后,殆晚年未定本”^[6]序文。访获此书后,张钊认为孤本仅存易于丧失,便将此书厘为6卷,编次校勘后于1929年铅印出版。1929年铅印本《中州集略》收录自汉至元河南籍(或流寓河南)文人别集共计445家,卷1为两汉至三国别集,卷2为两晋至南北朝别集,卷3为隋至中唐别集,卷4为晚唐至五代十国别集,卷5为北宋时期别集,卷6为南宋至元朝别集。全书为辑录体提要目

[收稿日期]2016-12-15.

[作者简介]史丽君(1980—),女,山东东营人,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古籍目录学。

录,先列集名卷数,无集名者即以其人历官姓名名之。各书提要引据正史叙作者籍里、生卒及事迹,正史无载者逐录地方志等史料,并引《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东都事略》《文献通考》《宋诗纪事》《孙氏祠堂书目》等各家著录以备查考,对于可参详处,则加作者按语予以考辨,低正文一格刊印以示区别。此书于著录别集之作者宦历事迹及作品文学成就多有考证及评论,可资参考处颇多。此书收录于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8 年影印出版之《地方经籍志汇编》。

(三) 纂修地方志

张宗泰曾参与编修清道光《河内县志》及《修武县志》。清道光《河内县志》36 卷,有清道光五年(1825 年)刻本,清袁通修,清方履箴、吴育纂,张宗泰以修武县教谕任总校,因邃于考据,于修志尤其是此书《经籍志》用功颇多。清道光《修武县志》12 卷首 1 卷,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 年)刻本,清冯继照修,清金皋等纂,此书清道光十九年(1839 年)袁俊叙记载《修武县志·舆地志》中“古迹”部分完成后尚少生色,便“与荻桥及张君鲁岩加润饰”,又请张宗泰撰《艺文志》称张宗泰“订正之力尤多”^{[7]序文}。此事张宗泰曾记曰“道光十七年,又相与(指与荻桥)重修邑志,历三载之勤劬,存一方之掌故。”^[8]

(四) 未刊著述

从《鲁岩所学集》自序及后人序跋中可以看出,张宗泰笃好读书,勤于校勘,其著述中多有未刊遗珠。如张宗泰曾示予阮元之《校正〈淮海英灵集〉》,今不见各家著录。又张宗泰自序中提到尚有《读太平寰宇记》《苕溪渔隐丛话》《瀛奎律髓刊误》《经义考》诸校本、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司马贞《史记索隐》失肢脱节处不下数百条等,均未及荟萃于一^{[9]序文}。清光绪丁酉(1897 年)孙葆田曾问诸其后人,知晓“先生所校诸书,大率散佚无存”^{[9]序文}。另据《中州文献总录》,尚有《游秦蜀记》《四库全书目录提要续录》^[10]未见刊刻。由此可见古人著述流传之不易。

二、张宗泰的目录学思想

(一) 论次目录体制

张宗泰于四部典籍目览手批,“或品评其得失,或纠正其讹舛,或增补其所未备”^{[9]卷6},深得目录学

真味并多有发明,对古典目录的体制、分类、体例等多有论述。

1. 肯定提要之学术价值

张宗泰曾多次申明治学以四库提要为宗。张宗泰在著作中对这种考据式提要非常推崇并身体力行。如其论《郡斋读书志》“所附遗闻佚事,尤足为辨章旧闻之资”^{[9]卷6},论《直斋书录解题》“叙述诸书源流,州分部居,议论明确,切为藏书家著录之准”^{[9]卷6},从这些评价可以看出他对提要内容的重视,因此他自己在著述时也非常注意钩稽得失、校正异同并详录之。张宗泰还运用读书札记、读书题跋和分卷考辨等方式以容纳更多考证内容,如《所学集》卷 1 考辨《资治通鉴》,卷 2 考辨《通鉴纪事本末》,这些篇目将对典籍内容的考证荟萃熔铸,充分扩充了提要体量和内容,颇益后学。

2. 发扬辑录体目录特点

宋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代表着辑录体目录正式产生。张宗泰采用了辑录体编纂《中州集略》,从历代正史、官私书目、方志笔记等史料中取材,贯通古今,博采众长,汇编诸多史料为一编,并将其考证的特点加以发扬,于多处加按语,形成辑考并重的辑考体目录,使得此书成为一部资料翔实的地方专科目录。

3. 研究方志艺文志编纂体例

张宗泰曾两次参与纂修方志艺文志,深明方志尤其是艺文志体例。如在《修武县志》中,将邑人经籍著述与涉及本地风土之文词遗篇加以区分,称:“郡邑志艺文一门,以各体文编入艺文者,用明人《无锡县志》例也,其以各体文消纳各类中者,用宋范成大《吴郡志》例也。范志较得体,今从其例。”^{[7]凡例}在《修武县志·艺文志》中,张宗泰指出:“昔班孟坚《十志》特轶艺文一门,只载书之卷帙及撰人名氏,厥后隋唐诸史咸因之,盖述作之体宜然也。郡邑志乘虽不得比于列代之史,然亦史之支流也。今修邑志既以前辈诗文分编入各门,俾以类相从,所有艺文一门,亦惟专收书名,用存一邑著述之大概,其前人有所论说及现今有所辨正者,并附下方使来者有考焉。”^{[7]卷9}可以看出,张宗泰在编修方志时,将有关本地风土的诗文遗篇分编入各门,这既保证了史料的丰富性和全面性,也保证了艺文志体例的精纯。

4. 辨析文献源流部居

张宗泰对《郡斋读书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孙氏祠堂书目》等书目的文献分类多有评议,从中可以看出他对四部分类法推崇备至,并对文献部居阐述个人观点。如张宗泰论“谱录类”源流:“《遂初堂书目》特创谱录一门,而一切茶经、食谱并菊、兰、牡丹、芍药诸谱均消纳其中,最为谛当。”^{[9]卷6}而《孙氏祠堂书目》一书以其无类可归,仍强并入农家,故张宗泰提出“盖编录书目,惟经史子集分类为无可增易,或欲别矜新裁,自起义例,其牵率不合,固事理之所必至。”^{[9]卷6}又如,在《中州集略》中,张宗泰对分类有疑难处皆以按语加以注明,他对《褚少孙集》按曰:“提要总集类《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下有曰:有本系史类而入之集者,如《褚少孙集》,全补录《史记》云云,知少孙本无所谓集,而张溥强名之耳。”^{[6]卷1}用按语的方式疏解分类疑义,尽最大可能保证典籍部居恰当。

(二) 钩稽典籍疏误

张宗泰每读典籍,都非常注重校正文字歧误,考证典籍内容疏失,他的这些校订成为后人整理文献的重要参考。张宗泰对文献内容的考证补充丰富有据,尤其是对文字、人物、地理的考辨内容较多较精,对文献内容的增补也对后学大有裨益。

1. 校正文本讹误

审定文本是读书治学的基础工作,张宗泰非常注重将典籍中的文本问题加以总结。就文字校对而言,主要涉及误字、漏字、衍字,即张宗泰所总结之“错讹之字、脱漏之字、添设之字”^{[9]卷4}。如《所学集》卷4《读〈三国志〉校字》指出了汲古阁本《三国志》中存在的诸如将“乐举”误为“乐莒”、“暴骨”误为“暴国”、“河内”误为“河南”、《张纮传》注衍“曰”字等23处讹误。又如《所学集》卷12《再跋〈吴梅村文集〉》指出《吴梅村文集》错漏衍误16处。在读书过程中,张宗泰不厌其烦,随手点勘,逐条雠校,意在嘉惠后学:“遇舛错处以细字写在上方,后之君子有欲重刊是书者,取吾说而更正之,当不无小补。”^{[9]卷4}

2. 考证人物生平

知人论世是古人治学的优良传统,张宗泰非常重视对人物籍贯、生平、行事的考证。如在《中州集略》中,各书提要首记作者籍里及事迹,遇有疑处多有考证。如《姚合诗集》一书按语中,张宗泰对《四

库全书总目》对姚合“宝应中历监察殿中御史、户部员外郎”的记载进行了考证:“案姚合元和十一年登进士第,上溯至肃宗宝应,凡五十余年,何以合于宝应中已为监察殿中御史也。且宝应建元只一年,亦不得言中,此应是缘《唐诗纪事》、《读书志》之误,未及细检耳。合作宝历中为是。”^{[9]卷4}纠正了四库提要对姚合生平记载的一处疏漏。

3. 考证地理沿革

张宗泰曾参与纂修方志,对地理沿革多有措意,题跋中对地理问题的考辨随处可见。如《读周语卷一》一则,考证了“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之“三川”为“泾、渭、洛”而非“泾、渭、汭”,文中张宗泰引用胡谓《禹贡锥指》《周礼》等史料,认为此处当是“洛”字,“不知何时讹落为汭耳”^{[9]卷4}。又如卷4《建安十八年省并州郡考》,梳理考辨了袁宏《后汉纪》和胡三省《资治通鉴》注中对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合并州郡记载的疏漏之处,文中所用史料丰富,考证严谨,结论确当。

4. 增补典籍未备

张宗泰对典籍记载之事,如有所心得,往往能以补充。如《所学集》卷7《书〈宾退录〉卷七后》中,张宗泰对“妇人统兵事”进行了增补,补充了晋张茂妻陆氏等8位妇人统兵作战的文献和事实。又如卷9《书〈居易录〉卷二后》,列举补充了诸多元代色目人著述。再如《所学集》卷15《四跋〈两浙輶轩录〉》,批评《两浙輶轩录》“所引诸家说部书及诗话,概不著撰人名氏,遂令读者于其中所叙述之事,茫然不知其所谓,亦一憾也”,特就耳目所及,补其缺漏,补记典籍作者若干,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三) 探讨著述方法

张宗泰在读书过程中,对典籍的著述体例和著作方法多有评论。分析其观点,从中可以习得著书为文之法。

1. 行文忌刊削过当

张宗泰认为在著书过程中,引用史料切勿刊削过甚,尽量避免由此导致的文义未恰、因果不明等问题。如“余读《通鉴》,至乐毅《报燕惠王书》、李斯《谏逐客书》、董仲舒《贤良策》,颇嫌其刊落过多,词意未能畅达,然不得以是为《通鉴》病也”^{[9]卷1}。张宗泰进而分析这种史料节引的背景和成因:“盖古之名臣硕儒其所论著,有关于天下国家之故,史臣率

择其切要之篇 编入本传 或为他人他事而发者 亦酌其所宜而入之。至易纪传为编年 则往往囊括千百年之行事 卷帙浩繁 又不得不于本传之中择其尤切要者 摘取数段或数语 以见其梗概 亦其势之不得不然者也。”^{[9]卷1}在此基础上,为了避免节引带来的弊病,他认为“必运以细心 精加持择 删其所可删 存其所不容不存 而后告无憾于来学 否则随意为剪裁 或其文前既加刊削 而其后又提出言之,彼此不相照管 致令未读全史者 茫然不知其指归之所属 则舛矣。”^{[9]卷1}张宗泰认为“史家记述之法 务须前后事理逐细检点”^{[9]卷2},这应成为史学著述的准则。

2. 著书作文忌讳重复

在读书过程中,张宗泰发现许多典籍存在前后重复之处,指出著述应统筹全文,切忌重复。如在《〈续资治通鉴〉事多重出》中,张宗泰指出《续资治通鉴》中“‘閭阎妇女小儿,皆号王德用为黑王相公’既见五十二卷第十九页,又见五十六卷第十九页”^{[9]卷6}等等 8 处重复之文。张宗泰据此指出“编辑史策 要叙述详明 不蔓不复 方无遗憾。其有一事而前后叠见者 虽非宏旨所关 亦不免繁冗之嫌也。”于若干条重复处,张宗泰也指出了解决之道:“当两处参酌而存其一 庶有当于谨严之旨耳。”^{[9]卷6}

3. 行文宜照顾上下文

张宗泰《鲁岩所学集》载“刘恕著《通鉴外纪》,其书不引据经传,惟以《国语》为主,而杂采诸家说以附益之。而于《国语》其割并剪裁之处,有未惬人意者。如《国语》卷十七,楚庄王使士亶傅太子申,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 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云云,一一分疏其所以然之故。《外纪》乃摘录其文曰‘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而令语故志等字,茫然不知其所谓。倘曰有《国语》原文在,可覆按也,则无取乎著此书矣。”^{[9]卷5}《国语》所载申叔时之言,是说太子学习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等典籍文献,以蓄其德。刘恕节引过多,将史文删节为“教之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节引后之“令语故志”在无上下文语境的情况下,颇不易理解。这正是由于史料剪裁时未顾及前后文,删节过多而未对前因后果略加解释,导致史文语意不明。对此,陈垣曾批注曰“节引古书应照顾上下文。”^{[2]72}

4. 使用年号宜遵从史实

针对历史上政权并立时期的纪年问题,张宗泰提出了宜遵从史实、各系其年号的方法。如在《〈通鉴〉归并年月》中,张宗泰认为“齐明帝建武元年,自正月至七月,所称南朝之主者,郁林王也;八月九月则海陵王也;至十月以后,萧鸾篡弑,始践祚改元建武,书法不容相假也。而《通鉴》削去郁林、海陵之元,于岁首即冠以建武之号。试思此九月中,凡有条教政令敷布于国中,所大书特书者,郁林、海陵之元乎,萧鸾之元乎?且引九月中,问其年号则建武也。至其称帝,则仍然郁林、海陵也,不名实之交紊乎?又如晋高祖天福元年,由正月以至十月,犹是潞王之天下也,乃于潞王有天下之日,即降称唐主,潞王不自降,石敬瑭又不得而降,而《通鉴》降之。此何说也,且不以敬瑭即帝位之日为天福之元,而以敬瑭即帝位之前十月为天福之元,何其待潞王者刻以薄,而待晋祖者优且厚也。窃以温公此等裁制,似失事理之平,且类于奖篡逆,不可以不辨也。”^{[9]卷1}这种各系其年号的做法,对于客观记述历史史实,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四) 推阐微旨得失

张宗泰在著作中较少空发议论,但是如果确有发明,往往能基于史实,允执厥中,充分发挥了目录学的学术批评作用。

1. 评价各类典籍学术价值

张宗泰博览群书,见识广博,因此往往能高屋建瓴,恰当评价典籍的学术观点和学术价值。如历来学者对《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帝魏帝蜀聚讼纷纷,对此张宗泰论曰“魏受汉禅,晋受魏禅,世代相承,此而正统归之,谁曰不宜?又况魏之地大兵强,据天下十之七八,一切条教号令,皆自之出。温公帝魏,亦酌量乎情事之轻重,以定予夺之准,而非必为符合本朝起见也。至蜀之为国,僻在一隅,声教不通于中邦,似与帝统无与矣,然昭烈为中山靖王之裔,民心不忘汉室。昭烈能延汉祚,以蜀为正统,亦天理人心之不容泯没者,而何可厚非也!”^{[9]卷1}张宗泰在分析各自立场之后,指出“帝蜀帝魏,均有一说之可通,正不必非承祚而是彦威,亦不必右朱子而左温公也。”^{[9]卷1}此论可谓通达明理,符合客观历史。又如张宗泰论《明诗综》学术价值“大率每人之下,先列前贤之评论,而以己所作《静志居诗话》附于其

后,或纠弹其偏曲,或增益其本事,或摘录其名句,不激不随,粹然一出于和平。其无可附丽者,亦不强为论说。尤足贵者,每举一事,辄元元本本,有伦有要,而其才学之渊博,实足以副之,不惟有资于谈诗,兼有资于说史,洵一代总集之翘楚矣。”^{[9]卷14}他对《明诗综》学术价值的评判恰当公允,其观点常被后世学者征引。

2. 评鹭历史人物功过得失

张宗泰多能结合历史情势,对历史人物做出中肯评价。如《所学集》卷1《王衍乐广善清谈》认为“推原祸本,皆武帝一念忌刻之私为之,而何得尽委罪于清谈诸人哉。”他分析了晋末的政治环境以及晋武帝的“忌刻之私”,指出了清谈诸人并非西晋灭国的主要原因。又如他论张浚“观人者,当统其一生行事而论之,又当究其居心而论之,不得执一节之失计,遂概没其生平,而訾议之也。张魏公当高孝之朝,其排李纲、张鼎,杀曲端,腹谏自用,措置乖方,富平之败,符离之溃,其丧失不可亿计,诚有不能代为解说者。然其念王室之多艰,刻愈为国家复仇,不以累挫而败其气,不以退废而回其虑,其肝胆所激发,殆有质天日而无愧者,且其当时势危急之秋,忠言谏论,无非为扶持国体起见,固不仅苗刘之变,慷慨以赴君父之难已也。其才虽疏,其居心未始不可原。盖瑕瑜互见之人也。”^{[9]卷3}张宗泰对张浚的评价比较切合史实,公允得体。

综上所述,张宗泰的目录学思想内容丰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中后期古典目录学的特点。一

是目录体制更加丰富和多样化。《所学集》虽无“目录”之名,而实则蕴含了丰富的目录学史料和思想,其内容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利用。二是目录提要更加注重文献内容的版本、校勘等。他在读书过程中大量地运用了校勘、版本、辨伪、考证的方法,对相关古籍的版本、内容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疏通、整理,为阅读提供了便利,为研究提供了线索。总之,张宗泰的目录学研究,以严谨考据为基础,将文献考辨、史实考证、文史评论相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阮元在《阮云台先生书》中称其书“近于《日知》《养新》”^[9],可谓至论。

参考文献:

- [1]陈垣.陈垣全集:第21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96.
- [2]陈垣.陈垣全集:第22册[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
- [3]孙犁.孙犁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2:71.
- [4]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356.
- [5]来新夏.清张宗泰古典目录学成就初探[J].南开学报,1996(4):24.
- [6]王广庆.中州集略序[M]//张宗泰.中州集略.民国十八年(1929)张钊铅印本.
- [7]袁俊.道光十有九年岁次己亥二月阳湖袁俊叙[M]//冯继照.修武县志.清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
- [8]张宗泰.与冯耘桥文[M]//张宗泰.鲁岩交游记.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
- [9]张宗泰.鲁岩所学集[M].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
- [10]吕友仁.查洪德.中州文献总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2:1514.

On Zhang Zong-tai's Bibliographic Thought

SHI Li-jun

(Historical Documents Department of Capit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100021)

Abstract: Zhang Zongtai is the author of *Lu Yan Suoxueji* and *Zhongzhou Jilve*, in which he elaborates his bibliographic ideas involving catalogue system, error finding, writing style and bookevaluation. Zhang Zongtai's bibliographic study is characteristic of diversity of the private catalogue system and the focus on error find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Key Words: Zhang Zongtai; bibliography

(责任编辑:彭巍颐)